

针 灸

历 代 帝 王 与 针 灸

江西中医学院 魏 稼

中国是针灸的祖国,早为举世公认。回顾大量的文献史料和出土文物,看看历代帝王与针灸的史实,再次无可辩驳地证明,针灸不但 是中华民族的发明创造,而且早已成为最高统治者御用的宫廷医学了。

帝王接受针治事例

在漫长的封建社会,接受针治的帝王不乏其例。

公元一世纪班固等撰的《汉书·外戚传·孝元冯昭仪第六十七下》,最早记载了汉武帝(公元前140~88年)曾接受过针刺治疗:“武帝时医修氏,刺治武帝,得二千万耳。”所谓“二千万”,当指赏赐财物而言。

众所周知的华佗为魏王曹操(公元155~220年)治头风,见于公元四世纪范曄撰的《后汉书·方术列传》:“……曹操闻而召佗,常在左右。操积苦头风眩,佗针,随手而差。”

北魏太医令李修,太和中(公元477~499年)常在宫内,“高祖文明太后时有不豫,修侍针药,治多有效。”事见公元六世纪魏收的《魏书》。

唐·李百药《北齐书》及李延寿《北史》称,北齐武成帝高湛(公元561~564年)患病,徐之才“针药所加,应时必效。”

公元十世纪刘昫等撰的《旧唐书·职官志》中称,唐代“太医署中”已有“针师”、“针博士”等官阶,表明针灸已正式列为宫廷医学。

唐太宗(公元627~649年)长孙皇后生高宗李治时难产,数日不得分娩,诏令医博士李洞元针之,“太子即诞”。事见宋·周密的《齐东野语》。《旧唐书·高宗纪下第五》称,高宗尝患

头重目眩,召侍医秦鹤鸣等针而立效。

公元907年,我国北方耶律阿保机(史称辽太祖)建辽国,号契丹。元·脱脱等撰的《辽史·方技列传》称,太祖患心痛,召迭里特诊治,认为“药不能及,必针而后愈。帝从之”,果针后痛止。

北宋仁宗帝赵祯(公元1023~1063年),多次患病求医,脱脱等《宋史》称,景祐元年(公元1034年),仁宗病,药未效,召许希诊治,“遂以针进而帝疾愈。”乃封翰林医官,并答应许希要求,在当时帝京开封城西隅筑扁鹊庙,纪念这位针灸祖师。又宋·张舜民《昼壘录》称,嘉祐初(公元1056年~),仁宗寝疾,药未效,召民间“草泽医”诊治,当针于脑后刺入,“针方出,开眼曰:好惺惺!翌日,圣体良已。自尔以其穴目为惺惺穴……,或曰即风府也。”还有《重修扬州府志》、《兴化县志》称,仁宗丧明,当时新化县郭忠(字恕甫)以针愈之,赐号“金针先生”。

元代,我国医生邹庚,曾去越南为陈朝裕宗帝嚳(公元1341~1368年)治病。《大越史记》及1957年3期《医学史与保健组织》陈存仁《中国医学传入越南史事和越南医学著作》一文称,裕宗幼时溺死,庚以针救活;裕丰元年(公元1341年)即位,封庚为御医;后裕宗又患半身不遂、阳痿等病,亦经邹庚治愈。

明宣宗朱瞻基(公元1426~1435年),也是出生时难产,得江苏吴江盛寅(字启东)针其母之后降生的。事载清·张廷玉等撰的《明史》及明·江瓘《名医类案》。

臭名昭著、自立为帝的袁世凯也曾请针灸名医治过头风。公元1938年出版的方慎盒《金

针秘传》称,民国三年春(公元1914年),袁世凯患头痛,三十余日不愈,南通张季直荐黄石屏治疗,作者当时曾作为袁氏弟子随从到京,当针刺百会、风池、风府后,应手而痛止,袁氏称奇不置,厚谢而归(见1950年7期上海《新中医药》)。

由此可见,从西汉到清末的两千多年时间里,不少帝王接受过针刺治疗,涉及的病种有头痛、难产、心痛、失明等,大多获得了立竿见影的疗效,得到最高统治者的奖赏。难怪西汉中山靖王刘胜(公元前113年)墓中的随葬品有金属的针灸针(见《人民画报》1972年12期),表明统治者对针灸的信仰程度,真可谓至死不渝了。

帝王亲属接受针灸治疗事例

古代针灸名医为帝王亲属治病的事例,也屡见不鲜。

战国时期(公元前475~221年),虢国(当指虢仲之后的北虢,即今山西省南部的平陆县。但刘向《说苑》谓为赵国)的王太子患尸厥而昏迷,适逢河北名医秦越人扁鹊游经其地,经询问病情,认为可治,虢君乃恭敬地出见,当用针灸而使太子复苏时,人们都盛传扁鹊能起死回生,但他对这种过分夸大的赞誉,作了实事求是的回答:“越人非能生死人也,此自当生者,越人能使之起耳。”事见公元前二世纪司马迁的《史记·扁鹊仓公列传》。

北魏李修为文明太后治病已见前述。此外,安徽《宣城县志》称,明·徐文中治镇南王妃风病,针合谷、曲池,次日即能起坐,镇南王“喜劳之”。

东汉和帝刘肇(公元87~105年)的太医丞郭玉,擅针灸,《后汉书·方术列传第七十二下》称,郭氏曾“医疗贵人,时或不愈,帝乃令贵人羸服变处,一针即差。”后来,和帝“召至诘问其状”?郭玉说:“……夫贵者,处尊高以临臣,臣怀怖慑以承之,其为疗也,有四难焉,自用意而不任臣,一难也;将身不谨,二难也;骨节不强,不能使药,三难也;好逸恶劳,四

难也。针有分寸,时有破漏,重以恐惧之心,加以裁慎之志,臣意且犹不尽,何有于病哉!此其所以不愈也。”一针见血地道出了上层统治者患病难以治愈的原因,也许和帝对此有所觉察,因而采取了“羸服变处”的明智措施,收到了预期的疗效。

《魏书·列传艺术第七十九》称,中山王英子略(约公元五世纪人)患病,名医王显等药不能疗,崔彧针之,抽针即愈。

明孝宗(公元1488~1505年)时,因“淮阳王病风三载,请于朝,召四方名医治不效,云(即凌云,字汉章)投以针,不三日,行步如故。”事见《明史·方技传》及《浙江通志》。

综上以观,针灸为帝王亲属治愈了不少危难病症。但作为御医,在施治中是谨小慎微、诚惶诚恐的。为帝王亲属治病尚且如此,那么,为帝王本人治病时的怖慑心情,更可想见了。

最高统治者对针灸的关注

统治者之所以对针灸表示关注,当然主要出于私心,如宋仁宗诏命王惟一撰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》、刻石碑、铸铜人;明英宗于正统八年(公元1443年)下诏重铸铜人,显然首先是为了本身保命延年的需要。

其次,则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,为笼络人心,巩固统治而作出的一种关心群众疾苦和尊贤敬能姿态。例如远古的黄帝,传说他与岐伯等研讨针灸,写成《内经》一书;又如唐初名医甄权(公元541~643年),深受唐太宗尊敬,不但命他修明堂,《旧唐书·方技传》称,贞观七年(公元643年),权一百零三岁,太宗还亲临其家看望。再如孙思邈(公元581~682年),也受到隋文帝、唐太宗、唐高宗的多次征召,《旧唐书·方技传》称,显庆四年(公元659年),唐高宗也召见了。至于《旧唐书·太宗纪下第三》及宋代欧阳修等撰的《新唐书·刑法志第四十六》谓太宗看到明堂孔穴图后,下令“决罪人不得鞭背”,则又是为了显示开明君主的“人道主义”以至对芸芸众生的“慈悲”胸怀。

有时,统治者把针灸作为一种外交工具,

如梁文帝于公元552年把《针经》送给日本钦明天皇(见《医事年表》);元世祖(公元1060~1294年)接见来中国的尼泊尔工匠阿尼哥,命他修铜人,给予了优厚的礼遇和嘉奖(见宋濂等撰的《元史·方技工艺传》),就与加强睦邻友好关系而采取的怀柔政策有关。

有的统治者是由于对针灸的兴趣,或为名垂千古、泽被后世,或迫于处境而采取的韬晦策略,于是把精力放到针灸医学这个慈善事业上来的。如曹操之子魏东平王曹芳专研灸法,撰《曹氏灸方》七卷,见晋·陈寿《三国志·魏书·武文世王公传》及公元七世纪魏征等撰的《隋书·江南通志》。又如明太祖王子朱橚,封于开封为周王,于公元1406年主编大型医学丛书《普济方》,中有48万多字的针灸专著;再如朱元璋十六子宁王朱权(公元1378~1448年),在南昌命刘瑾改编其师陈会的《广爱书》为针灸《神应经》。都与他们的特殊处境不无关系,因为中国历史上象曹操和朱元璋的后裔那样互相倾轧、互相残杀的事例是较为典型和突出的。

历代帝王对针灸的关注,有时表现得很审慎,如《扁鹊仓公列传》载西汉文帝(公元前179~155年)下诏询问名医仓公(淳于意)治过的患者、病情、疗效等情况,显然存在着不轻信的态度;又如《明史》称孝宗帝听到凌云针技高超,被召到京,也只是在令试针蔽衣铜人中穴后,才给了他御医这个官职。

统治者对针灸的关注,虽然具体目的不同,方式有异,但也应当肯定,对促进学术发展,具有一定进步意义。当然,针灸之所以能得到他们的青睐,归根结蒂乃是它的疗效换取来的。

独裁者的权势和残暴

史料记载也反映了独裁者至高无上的权势,前述宋仁宗患病,当许希提到需“针心下包络间”(当指上腹部穴)时,在场大臣表示反对,结果还是诸黄门官请先试针,然后才接受治疗。又如《北史·赵王果传第五十九》称肖后

病用灸,果请为之试炷。都是奴才畏惧主子权势,不得不违背自己意愿而作出的“忠君”行动。

独裁者草菅人命、对臣民的残暴行径是令人触目惊心的。前述唐高宗患头风眩命秦鹤鸣、张文仲等针治一事,亦见《新唐书·则天武皇后传》及《谭宾录》,据称,当武则天在帘后听到秦说要针刺皇上头部出血时,认为冒犯了天严,便勃然大怒,即命处斩,后因高宗说情,接受了治疗,收到效果,才算免了这次灭顶之灾。又如《北史·列传第二十二张融传》载,徐文伯同宋后废帝(公元473~475年)出游乐苑门,“逢一妇人有娠,帝亦善诊,诊之,曰:此腹是女也,问文伯,曰:腹内有两子,一男一女,……帝性急,便欲使剖,文伯惻然曰:若刀斧,恐其变异,请针之立落。便写足太阴(三阴交)、补手阳明(合谷),胎便应针而落。两儿相续出,如其言。”充分暴露了独裁者为所欲为,可随意宰杀无辜平民的凶恶嘴脸。

独裁者的残暴,有时还表现在对待针灸医学方面,如《南史·齐本纪第四》称,当时(公元479~501年)灸法盛行,有人从北方学来火灸法,“贵贱争取之,多得其验,二十余日,都下大盛,咸云圣火。诏禁之不止。”又清宣宗道光帝于公元1822年也下诏废止太医院针灸一科。这些无情的打击与摧残,并未使深受广大人民群众信仰的针灸为之灭绝和消亡,相反,仍以巨大而旺盛的生命力和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继续向前发展。

针灸,作为一种疗法,它发源于我国的石器时代,而形成医学,则肇始于两千多年前的战国秦汉时期。任何人想否定这个结论,都将是徒劳的。

建国以来,针灸医学对全人类健康作出了应有的贡献,受到了国内外舆论越来越广泛的重视,如今,它已成为世界医学组成部分之一了,祖国医学的针灸之花,正在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开放!我们深信,中华民族这一灿烂的古文化,必将在世界医坛焕发出更加绚丽夺目的光辉。